

佛教词语的构造 与汉语词汇的发展

梁晓虹 著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佛教词语的构造 与汉语词汇的发展

梁晓虹 著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57 号

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

梁晓虹 著

*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7.625 印张 188 千字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3000 册

ISBN 7-5619-0353-7

H·247 定价:8.50 元

序

汉译佛典是研究汉语发展史的好材料。梁晓虹同志的《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一书就是以汉译佛典为对象而展开研究的。书分二编，上编论述汉译佛典中的佛教语词的构造，分为音译词、合璧词、意译词、佛化汉语、佛教成语五种方式，都是汉译佛典语词的重要结构形式。其中的合璧词——即一半音译，一半意译构成的词，如摩登伽仙人，无余涅槃等，和单纯音译或单纯意译不同，颇堪注意。下编论述汉译佛典中佛教词语的创造带来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性转折，详细论述了树立了吸收外来词的样板、扩充了汉语词汇的宝库、丰富了汉语词汇的构造方式、加速了汉语双音化的进程、促进了汉语口语化等五个方面，这些都说明了佛教词语影响丰富了汉语词汇的内容和发展的情况。而促进汉语口语化的发展尤其使我们感到兴趣，佛教徒为了弘宣教义，所以力图在其经典中使用通俗易懂的口语，以便使群众易于接受。这样必然影响到汉译佛典，或从属于佛典的俗讲、变文之类的文字记录中，我写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中所解释的词语全部属于口语范围，就是明证。综观全书，纲领宏伟，论证详实细密，读者自能同意这个概括。简单申说几句，以为引言。

蒋礼鸿志于杭州大学中文系

一九九二年十月六日

前 言

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古印度的佛教，到公元前三世纪，因孔雀王朝阿育王的光大弘传，一跃而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与印度为邻的中国，自然最先受其影响。根据种种记录和传说，可以肯定，两汉之际，佛教已东渐传进中国。

自此，佛教就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化现象在中国这片古老、辽阔的土地上，蓬蓬勃勃地传播开来，形成历史非常悠久、内容极其丰富的汉地佛教文化圈。

从神奇的“白马驮经”东来，安息王子安世高成为译经先锋开始，无数热忱的异族、异国传教者，历千难万险，从千山万水之遥的“彼岸”携来珍贵的梵文系统经卷；继而，又有许多富有献身精神的汉族僧人，踵事增华，为求真理而百折不挠，涉流沙，越葱岭，西行取回真经。其中捐躯献身者无虑数十百。中外高僧大德的共同努力，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佛经翻译运动。这一震撼中华大地的不朽盛业，持续了十个世纪（二至十一世纪）之久，翻译过来的纪律论三藏凡一千六百九十余部，六千四百二十余卷。出现著名中外译师有二百余人，其中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等都是中国翻译史，乃至世界翻译史上著名的大师。浩瀚的翻译佛典，为灿烂的汉民族文化增添了巨大的精神财富，成为佛教东来，植根中土的最基本、最关键的因素。于是，佛教，这本属完全不同质素的语言、文化系统，历两千年漫长的岁月，经试探、依附、冲突、改变、适应、融合种种阶段，深深地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

领域，与汉民族固有的儒、道思想文化相汇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请看：

佛教，在中国哲学史上，放射出独特的光辉。除其本身所蕴藏的极深的智慧外，佛教彻底否定现实世界，大胆追求精神解脱的心理建构和思想旗帜，使之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都表现出深刻、独到的见解。它与中国古代哲学彼此影响、相互挑战，乃至文参互函，推动中国哲学不断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从而扩大了中国哲学的范围，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容。

佛教，对古老的中国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使其各个领域更加异彩纷呈，“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晚唐诗人杜牧的这句诗，生动地描写了唐代梵宫佛刹遍布的景象。而造型精美、千姿百态的佛塔，更成为我国古代建筑艺术中一支独秀的奇葩。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那无数精美、别异的佛寺、佛塔，是佛教艺术与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结合的精品。早在阿育王时代就以造型精美的佛像雕刻而著称于世的佛教雕刻，传进中国，其直接的结果是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佛教石窟保存数量最多，分布地区最广，延续时间最长的艺术宝库。起源于佛经的十分精彩、极富感染力的“经变画”，生动新鲜、色彩灿烂的寺庙壁画，给古老的中国绘画艺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丰富了中国绘画的内容和形式，为中国的画家们提供了驰骋艺术才能的更广阔的天地。相传早在三国魏时，曹植就闻“梵呗声腔”，而到北魏，则更是“梵唱屠音、连檐接响”，唐代又吸收了不少来自天竺等佛教国家的音乐，有些至今还保存在寺庙中。

佛教，给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充实了新的活力。对此，早在二十年代，胡适先生就作出了公允的评价：佛教“给中国文学史上开了无穷新意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①源于印度民间文学的佛典文学，由于佛典的流通、僧人的传布，深入民

间，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推动了律体诗的产生和诗歌的发展；佛教直接导致了通俗文学——俗讲、变文、宝卷、弹词、鼓词的相继产生；佛教为近代通俗小说提供了丰富的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佛教的一些学说丰富了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内容。

佛教，使中国的民间习俗得到了极大的开拓和扩展，派生或形成了许多的新内容、新形式。特别是受“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佛国净土”、“饿鬼地狱”等的宣传，人们相信果报、轮回，悔罪植福，修德禳灾；烧香设供，许愿还愿；崇拜庙神，建寺造塔；布施贫病，修桥铺路；广作法事，超度亡灵；积聚功德，提倡放生；吃素食斋，品茶斗茶。佛和菩萨们已从高人云端的莲座、从荒山大野，进入到世俗社会的千家万户，深入到民间的市井勾栏瓦舍。故无论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岁时节日、游艺娱乐，“佛”的慈光法影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佛教。作为一个完全不同质素的语言、文化系统，已在中土深深植根、结果。乃至佛教在印度本土从七世纪起历遭“法难”而至十一世纪惨绝之时，中国俨然已成为国际上佛教文化的中心。这种文化现象的移置，充分显示了佛教在中国广传的结果——中国佛教化，深刻说明了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趋势——佛教中国化。这样显明的结果，这些引人瞩目的事实，这种必然的趋势，使人们悟知：不懂得佛教，不研究佛教，就无法全面认识和评价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艺术以及其他文化领域的历史，也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

二

为全面研究佛教文化，也为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必须研究佛教文化与汉民族语言的密切关系。

语言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早在一个世纪以前，西方的一些语言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就对此有过论述。如德国

语言学家、普通语言学家的创始人洪堡特认为:语言决定人的世界观。德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语言学家赫尔德则认为:语言的性质就是该国文化的特质。此后,人们继续了这一问题的探讨。如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提出语言决定文化的观点,他的学生沃尔夫也认为语言决定着文化的规范。随着人们对语言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认识的不断深入,“人类文化语言学(ethnolinguistics)”这一学科得以逐步建立,而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早在四十、五十年代就注意到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著有《语言与文化》,卓有功绩。当然,在源远流长的汉语史的研究中,我国古代许多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有代表性的语言著作,虽然多对字词语句作微观的研究,但也都涉及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并有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的不少成功之例。《说文解字》、《尔雅》、《广雅》、《通雅》等,都值得我们认真发掘、总结。

总结前贤的论述、研究。根据当今人们对语言与文化关系所进行的探讨,可以得出以下的基本结论:语言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因素,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萨丕尔所说:“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②所以,人们在对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诸学科进行研究时,不能忽视语言学,须把它们互相结合起来研究,才能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另外,语言又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因为语言的作用,文化得以传播和继承;通过对语言的全面深入研究,人们才会全面深入地了解文化。所以,在文化的各分支中,语言处于一种特殊的、极为重要的地位:语言是研究文化的一把钥匙。

纵观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可以知道:语言的产生意味着灿烂多姿的人类文化的诞生,而在人类文化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语言起了关键的作用;同时,文化的不断发展也促使语言更加丰富和细密。正如著名的语言学家柏默(L.R.Palmer)所说:“语言的历

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他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③

语言的基础是词汇，所以语言与文化之间所存在的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词汇上就表现得最为突出，“当一种‘模式’的文化制度被另一种文化制度所取代时，相应的词汇也往往会跟着变化或消失。”^④罗常培先生的《语言与文化》之基本内容就是从词汇的角度探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柏默也认为“词和物”——语言史和文化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互相提供证据和互相说明。而在他的《语言学概论》中则用专门的章节《文化和语言》讨论这种关系。例如通过印欧语系诸语言中一系列表示建筑材料、建筑技术、建筑工艺的词来分析古代的建筑文化；通过文化史的研究，来阐述有关词的词义、词源；通过对语言借贷情况的分析来研究文化的接触及民族的关系。最突出的是，通过对英语中借词的研究，来阐明英国人的混和文化；通过与宗教有关的词的分布情况的探索，去追溯欧洲人皈依基督教的过程；通过地名的考察，用重要的证据来补充并证实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论点。诸多的事实，足以说明语言与文化，特别是语言中词汇与文化的密切关系。

汉文化与汉语，尤其是与词汇的关系，同样如此。现在，越来越多的学人已经认识到，并正在从事语言与文化结合的研究。借鉴汉语语言，尤其是词汇研究的丰富成果，来探索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历史；吸收汉民族文化史研究的丰富成果，来研究汉民族语言，特别是词汇的发展变化。

佛教东渐来华，既然与汉文化相融汇，并成为汉文化的主要部分，自然与汉语——汉民族文化的载体、汉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不少学者在研究佛教的同时，对此已有所注意和探讨，并且卓有成果：

音韵上，前辈时贤已证明：四声的发现就跟佛教徒转读佛经，以及当时的文士和僧侣受梵文拼读方式的启发而注意、研求汉语音节结构密不可分。字母的产生也得助于佛教的传入，无论

是“字母”这个词本身，还是关于声母发音部位的名称，乃至字母的制定人，都与佛教有关。虽然反切的原则和雏型在汉代或汉代以前就已经有了，但它的成熟和被自觉地用于注音，要到梵文经典的大量传入，受其启发和影响才成为可能。等韵是受到佛教“转唱”佛经的启发而萌生，它们的最初创立者应该是僧侣，或与佛教有密切关系的文人。甚至韵书的出现，也是受梵文影响的结果。

语法上，梵汉两种语言的对译，使汉译佛经里留下了梵文文法的踪影。梁启超先生总结佛经译文文体特点有十条，其中就有涉及语法方面的内容，如译经中倒装句法极多，提问句法极多，句中或段落中的解释语多，承前复用的词语多，名词前的修饰语多等。^⑤另外，在汉魏六朝的译经中已经能见到不少汉语中新兴的语法成分，如“将”、“把”、“着”、“了”、“便”、“就”、“还”、“边”等，这是佛教争取群众，接近平民，佛经原本、译本多通俗的必然结果。^⑥

那么，在词汇方面，即佛教文化与汉语词汇发展关系的研究，其进展与成绩如何呢？

汉语词汇，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但通过它本身的发展规律日益丰富起来，同时也通过外来文化的引进，不断吸收兄弟民族和世界各国民族的语言来丰富自己，加强自己的表现力。历史上，因中外文化互通，对汉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对汉语词汇产生较大影响的有三次：第一次是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以后，汉民族与西域各族有了各种文化交流，于是在汉语中就留下了一些西域借词和译词；第二次是因佛教文化的输入，因翻译佛经而产生了大量梵语系统的借词和译词；第三次则为明清之际，我国开始了和欧洲的交通，西洋的传教士和商人陆续来到了中国，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汉语又增添了一些来自西方语言的借词和译词。无论是按照借用的来源和时代，还是按照借用的方式，或者是按照同化的程度，这些不同的标准来分类，从汉语

词汇发展史的角度看，在鸦片战争以前，对汉语词汇影响最大的，要算中古时期（东汉迄唐）由于佛经传入的那一次了。

对此，前辈时贤已作过不少开拓性的研究工作，如唐代玄应《一切经音义》、慧琳《一切经音义》，都广征博引，搜罗宏富。不仅对佛家经典字音字义的阐释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由于它保存了大量久已失传的古代字书韵书和其他文史典籍，又为古籍辑佚、校勘、训诂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宋代法云的《翻译名义集》，则解释音译梵文二千多条。近人熊十力先生的《佛家名相通释》，则依据《五蕴论》，综述法相体系；依据《百法》等论，综述唯识体系，是提纲挈领疏释名相的重要著作，它帮助人们理解名相术语，从而能使“玄关有钥而智炬增明”。而近现代学者梁启超、罗常培、高名凯、王力、蒋礼鸿、潘允中等，都在其论著鸿篇中对佛教文化、佛教词语有所论述。这些，都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然而，毋庸讳言，与其他的文化领域相比，结合佛教文化来研究汉语词汇的工作，进展与成绩尚不尽人意。在认识上，未能认清佛教在中国文化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也不能明确佛教与汉语，尤其是与汉语词汇的密切关系。^⑤故尔不重视全面研究佛教在中国文化中所起的作用，忽略了佛教对汉语，尤其是词汇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方法上，没有从词汇学、词汇史、汉语史、文化史的角度出发，对佛教词语展开全面的分析研究，而是停留在列举词例的表面，所举之例亦多为“人云亦云”者。材料上，多只引常见的几部经书，对浩瀚的佛典未作全面爬梳，故在研究中，未能充分运用这一部分极宝贵的语言材料。唯其如此，至今，对佛教词语——汉语词汇中最富有特殊色彩的一部分，作全面、科学的分析，并把它置于佛教文化和整个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与汉语词汇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进行较全面系统研讨的工作，尚无成功之作。而事实已经告诉我们：这是一项相当重要、非常必需、十分有意义的工作。这也许是整个汉语史，特别是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步履维艰、进展缓慢

的一个突出表现和潜在因素。由此悟知:不懂得佛教,不研究佛教,就无法全面认识和评价汉语词汇的历史,无法写出真正的汉语词汇史、汉语发展史。

这就是本文撰作之“缘起”。

三

张永言先生认为,研究外来词不能仅满足于研究它从何处来,何时来,为什么传来和怎样传来,而是“要研究它是怎样被同化的,也就是说它是怎样服从或适应借方的语音系统(包括音节构造)和语法结构(包括构词法)的,它的意义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它的出现引起了借方词汇里的哪些变化,等等。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外来词的研究阐明语言词汇发展的规律性,说明词汇中发生的现象及其原因,揭示个别词语的历史、语言的历史和人民的历史三者之间的关系。”^⑧实际上就是要揭示词语的历史、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佛教与汉语词汇来说,就是要通过对佛教词语的构造所作的较全面的描写、分析、归纳,使人们能对佛教词语——佛教文化的载体,有一种立体的全方位的了解。从而把对佛教词语的研究与汉语词汇的发展相结合,并放在中国文化这个大背景下进行全面系统的研讨,以揭示佛教本身作为文化的一种形态,对汉语词汇——汉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

我们初步的研究表明,佛教对汉语的影响确实在词汇上尤显突出。因翻译佛经的需要而产生了大批的佛教词语,如近代日本所编《佛教大辞典》就收了三万五千多条。它们是汉语词汇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其中有照搬原音,转写成汉语的音译佛教词语。作为纯粹的外来文化的佛教,许多概念、术语难以在汉语里找到相应的词汇,故佛经中有大量音译词。其中有一些常用的音译词,简化而为单音节或双音节,这既适应了汉语内部发展的规律,又

满足了进一步构词的需要。许多常见、通用的音译佛教术语(大多数为节译者)与汉语词相结合则组成“梵汉合璧词”。因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也因为汉语本身巨大的抵抗力,“梵”(音译)的汉化程度不断加深,故而“梵汉合璧”的词都有较强的生命力。大部分的佛教词语是通过意译而产生的。因其是用汉语固有的造词材料,根据汉语的造词方法与梵语词所概括的内容构成的新词,故特别能融入汉语,佛经多用比喻的特点,决定了佛经中多因比喻所造的词。这种形象、生动、富有色彩的一部分,形成了意译佛教词语的明显特色。充分利用汉语的固有词来表示佛教的新内容——“旧瓶装新酒”,则属于佛化汉语。现有词的意义经过有规律的运动变化,从而可用来表示新概念,这语词一般命名的常用方法,在佛典里得到了充分运用,使一大批汉语词不同程度地蒙上了一层宗教的色彩,丰富了汉语词汇的意义系统。源于佛教的成语,占了汉语史上外来成语的最高比例,是汉语成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本来宗教色彩极浓的固定短语或其他短语,进入汉语后,或从结构上得到了固定,或在意义上有了新的发展,其结果是增添了汉语成语的色彩,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

初步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佛教词语伴随着佛教的输入、弘传而在汉语里产生、发展。它们的构造又对汉语词汇的发展远非一般的渗透,而是引起了历史性的转折。这主要表现于汉语词汇史上以下几个重大的问题:

(一)树立了吸收外来语的样板。一种语言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合外来语言是使其丰富多彩的重要途径。汉语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随着历史上多次外来文化的输入,不断地吸收异族、异国的语言。佛教词语,作为鸦片战争以前汉语词汇家族中所吸收的外来词语的最大群体,它们创造的多样化汉字音译、音兼意译地创造新词、半音半意地创造合璧词、尽可能多地运用口语词,为现代汉语外来词语的创造树立了样板。

人们在对汉语外来词的研究中，往往只是孤立地把对象主要放在源自西欧语系的词上，从而不能发现现代汉语中不少外来词创造的常用方法，正是一千多年以前梵汉对译传统的继续，不能溯清这种历史发展的线索。

(二)充实了汉语词汇的家族。一个民族在与同他国、他族的文化交流中，是否能博采众长为己所用，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的文化内涵，其语言词汇的丰富程度是标尺。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外来的文化浪潮一次又一次地推波助澜，丰富和充实了汉语词汇家族，特别是因翻译佛经、著撰佛典而产生的大批佛教词语。纵观中国文学的历史，佛教词语融入汉语，源远流长；横剖汉语词汇各个断面，佛教词语融入汉语，类夥面广。特别是在哲学、文学、民俗及一般日常用语中，佛教词语更是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佛教的发展，一些佛教基本词深入汉语血液，故汉语根词的队伍得以大大扩充，在此基础上，不断派生、创造新词，继续起着扩大汉语词汇家族的积极作用。

(三)丰富了汉语词汇构造的方式。丰富的词汇构造方法是丰富多彩的语言词汇的基本体现。大批意译的佛教词语的产生，巩固并发展了汉语语词的构造方法。我们从造词法的角度去观察，佛经中的比喻造词，以其明显的特色，丰富了汉语比喻造词的方法；又以其丰富的内容，为人们研究汉语比喻造词法提供了历史的线索。从构词法的角度观察，佛教词语的构成，可谓汉语构词法的全面运用，既适合了中古时期汉语构词法的发展，也因佛经的特点而别具特色。

(四)加速了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进程。汉语词汇双音节化是汉语词汇发展的必然趋势。佛教的输入及发展，导致更多的新概念的产生，是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重要原因。通俗、白话的文体的特点，决定了翻译佛经中多用汉语本有的双音节词语，无论是承古习用，还是利用时语。更为重要的是：汉语音节简单与印欧语

系音节复杂的差别，佛教概念深奥、细微、抽象等特点，决定了梵汉对译所产生的新词，无论其为音译、梵汉合璧或意译，均以复音词为主，而其中又以双音节词为主。故大批双音节的佛教词语的产生，为中古以后双音节词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加速了汉语双音化的进程。

(五)促进了汉语口语化的发展。佛教由于争取群众、宣传教义的需要，决定了无论佛经原文或翻译佛经都多用口语的特点。故翻译佛经作为重要的口语研究的材料，反映了中古时期的语言实际面貌。而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有一部分佛教词语跨出“佛门”，深入民众语言，从而从宗教语言发展为民众口语。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佛教词语与汉语词汇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佛教直接导致了唐以后变文、宝卷等敦煌俗文学的产生，佛教词语也就成为敦煌口语词汇的重要源头之一。敦煌俗文学在民众中的广泛传播，又进一步促进了佛教词语——汉语口语的发展。故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也就促进了汉语口语化的发展。

四

我自1982年受业于徐复教授，攻读硕士学位起，就开始研读佛经，做一些初步的佛教词语的探研。在徐师悉心指导下，完成了《汉魏六朝佛经意译词研究》的硕士论文。1988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受业于蒋礼鸿教授，郭在贻教授、黄金贵副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使自己获得了全面读经、对佛经词语进行研究的好机会。我决心在以往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佛教词语与汉语词汇发展的新课题。三位先生认真的治学态度，严谨的治学方法，使我受益匪浅。在蒋礼鸿师、黄金贵师的认真指导、悉心教诲、热情鼓励下，经过三年的读书、构思、写作，几易其稿，终于完成了此论文的写作。在此我衷心感谢蒋礼鸿先生、黄金贵先生的辛勤培养和教诲，感谢古汉语教研室祝鸿熹等诸位先生的指教与帮助，并以此

论文深切表达我对先师在贻先生的缅怀之情。

我对佛教词语作一些研究，也得到了佛教界大德的鼓励与帮助。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副院长元湛法师。金陵刻经处李安先生、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圣严法师都曾给予我热情的鼓励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要作两点说明：

1. 我们研讨的对象是汉语佛典中的佛教词语，并非有关原始佛教的语言诸问题，所以，在引用一些原文名称时，则统称其为“梵文”。^①

2. 所谓汉语佛典，指翻译梵语系统文字而成的汉语佛典。还有汉地佛教著述，即佛教传入中土以后汉地佛教徒撰著的佛学著作，依内容可分为各宗要籍、史传、经录、类书、杂著等。所用佛典材料，主要版本是日本的《大正新修大藏经》。其用以参校的底本甚多，校记详细，印刷精美，便于检索，仍是目前最好的一种佛经版本。另外还有宋代碇砂藏的影印本、平伽藏及还在陆续出版中的《中华大藏经》，另外还参考了一些零散的刻本。

本文仍只属对佛教词语研究的初步尝试，其目的是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以把文化与语言结合起来，扩大汉语词汇的研究领域。本文的许多看法只属个人的管窥之见，是这几年研读佛经的心得，偏失疏漏在所难免。敬企专家、学人批评斧正。

注释：

① 见胡适《白话文学史》P202。

② 见 Edward Sapir 《Language》P129 中译本。

③ 见 L. P. Palmer,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Linguistic》P151。

④ 兹维金采夫《普通语言学纲要》P281。

⑤ 见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饮冰室文集》卷六一。

⑥ 见董琨《汉魏六朝佛经所见若干新兴语法成分》。

⑦ 如黄河清在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 29 期上发表《试析汉语中外来词过少的原因》就认为汉族人民只有一小部分人信奉佛教，故佛教外来词的实际使用范围很有限，无法深入汉语，佛教词语对汉语词汇的影响很小。

⑧ 张永言《词汇学简论》P94.

⑨ 翻译佛经的原文是由多种文字写成的。有曾在印度西北部和中亚细亚通行的佉留文；有由印度南部地方口语几经演变而成的巴利文；还有“胡语”——安息文、康居文、于阗文、龟兹文；但总的来说，以梵文经典占主要部分。而早期译经，后汉至南北朝，以印度古代俗语和西域古代文字为多，南北朝以后的译经就开始重梵本而轻胡本，隋以后所译的佛经原本，则统属梵本。